

编委会主任：雷春美 张燮飞 王光远 李祖可 ○

总主编：苏文菁 ○

闽商发展史

• 异地商会卷

苏文菁 主编 ○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总 主 编： 苏文菁
副总主编： 许 通 陈 幸 曹宛红 李道振 谢小燕

闽商发展史

• 异地商会卷

苏文菁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商发展史.异地商会卷/苏文菁主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615-6110-2

I.①闽… II.①苏… III.①商业史-福建省 IV.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0559 号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薛鹏志
装帧设计	李夏凌 张雨秋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39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253(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889mm×1194mm 1/16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280千字
印数	1~2000册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闽商发展史》

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编委会主任：雷春美 张燮飞 王光远 李祖可

编委会副主任：翁 卡 臧杰斌 王 玲 张剑珍 陈永正

编委会成员：

陈爱钦	陈春玖	陈 飞	陈国平	陈建强	陈鉴明	陈景河	陈其春
陈秋平	陈少平	陈祥健	陈小平	邓菊芳	冯潮华	冯志农	傅光明
郭锡文	洪 杰	洪仕建	胡 钢	黄海英	黄健平	黄 菱	黄如论
黄 涛	黄信焜	黄忠勇	黄子曦	江尔雄	江荣全	景 浓	柯希平
雷成才	李海波	李家荣	李建发	李建南	李 韧	李新炎	连 锋
林国耀	林积灿	林荣滨	林素钦	林腾蛟	林 云	林志进	刘登健
刘用辉	欧阳建	阮开森	苏文菁	王亚君	王炎平	翁祖根	吴国盛
吴华新	吴辉体	吴泉水	徐启源	许连捷	许明金	杨 辉	杨仁慧
姚佑波	姚志胜	游婉玲	张琳光	张轩松	张祯锦	张志猛	郑玉琳
周少雄	周永伟	庄奕贤	庄振生				

专家指导组成员：

苏文菁 徐晓望 王日根 唐文基 王连茂 洪卜仁 郑有国 罗肇前
黄家骅

总 主 编：苏文菁

副总主编：许 通 陈 幸 曹宛红 李道振 谢小燕

闽商发展史·异地商会卷

编委会

主 任	王光远	王 玲	李祖可	张剑珍		
副 主 任	陈 峰	江荣全	李建南	陈建强	陈 飏	
编 委	苏文菁	李君琳	刘 军	曹宛红	郑玉明	魏明蒂
	陈春玖	阮志雄	叶少华	赵文闪	戴洪九	倪新财
	陈金富	李建国	吴庆和	许荣茂	吴端革	韩世忠
	陈能豪	陈锦焰	陈涵霖	吴培辉	李贤义	许明金
	苏景昌	林秀才	黄祖仕	陈新贤	林明香	陈 湘
	尤文献	柯元枝	庄铭聪	林后辉	蔡少东	范国忠
	黄添进	洪本练	邹贤斌	吴建发	林法清	

闽商发展史·异地商会卷

编纂课题组成员

主 编	苏文菁					
撰 稿	苏文菁	王日根	章广博	程龙吟	高红霞	

总 序

闽商是孕育于八闽大地并对福建、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巨大贡献和影响的商人群体,是活跃于国际商界的劲旅,是福建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千百年来,为了开拓新天地,闽商奔走四方,闯荡大江南北;漂洋过海,足迹遍及五大洲,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们以其吃苦耐劳的秉性,超人的胆略,纵横打拼于商海,展示了“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爽义气,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闽商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盛世修史,以史为鉴,利在当下,功在千秋。为了不断丰富闽商文化内涵,更好地打造闽文化品牌形象,持续提升“世界闽商大会”品牌价值,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进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我们把《闽商发展史》研究编纂工作作为闽商文化研究的重大工程,并于2010年8月正式启动。《闽商发展史》全书十五卷,除“总论卷”之外,还包含福建省九个设区市,港、澳、台、海外以及国内异地商会分卷,时间上从福建目前可追溯的文明史开始。2013年6月,我们在第四届世界闽商大会召开前夕出版了《闽商发展史·总论卷》,并以此作为献给大会的贺仪。今天,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还带着淡淡的油墨芳香的是《闽商发展史》各分卷。《闽商发展史·总论卷》和《闽商发展史》各分卷都是《闽商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商发展史·总论卷》的总论注重闽商发展历史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设区市卷和港、澳、台、海外、国内异地商会卷侧重展示闽商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以丰富的史料与鲜活的案例,为福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文化建设增添了厚实的基础,为中国海洋文化、商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本土的文化基因。

欣逢伟大的时代,是我们每个八闽儿女的幸运;实现伟大的梦想,是我们每个八闽儿女的责任。今后,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深入开展闽商文化研究,以闽商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激励广大闽商,引领弘扬闽商精神,让广大闽商更加积极主动地把爱国热情、创业激情和自身优势转化成实际行动,融入“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的伟大实践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

雷春美

前 言

商会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商人们自觉的组织形式。在中国,商会发展有两个高峰期: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被欧洲的全球化纳入了全球的分工体系,商人们也从松散的个体被清政府“劝办”而建立起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商会组织。应该说,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商会有着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活力被激发,个体工商业者逐渐成为社会最具创作力的新阶层,党与政府适时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引导、鼓励商人们恢复商会组织。中国的商会发展迎来了另一个新的高峰。

福建作为中国海洋文明最为典型的区域,闽商作为海洋文化的践行者,行商全球、汇通天下是其文化性格。从现有的资料看,闽人在距今 6000 多年前就能够借季风洋流的力量,一方面不断地向海洋深处迁徙,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足迹;另一方面,闽人更是在东亚大陆东部的海岸线以及诸多岛屿上梯度开发,造就了闽人在北到长江口以南、东至台湾诸岛、南至海南诸岛的族群传播。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意义的商人以及商人集团(阶级)的出现是在突破陆地经济的锁闭式结构、在海洋贸易拉动之下而产生的。闽商作为海商之不同与其他中国商帮的特别意义也就在于此。闽商文化最重要的特色就在于它的海洋性,具体表现在开拓、冒险、多元、包容、共享。

唐朝中叶,由于怛罗斯战役(751 年)的失利与“安史之乱”(755—763 年)的爆发,黄河流域生灵涂炭,陆上丝绸之路无以为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由黄河中上游开始向东、向南转移,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一个大发展阶段。以福建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成为构建中古世界海洋经贸与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闽人经商的能力与海洋族群的天性具备了生长为闽商群体的时代需求,闽商群体华丽亮相。我们看到,从唐宋元到明清时期、再到当代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共经历了三次“向海”发展的历程。唐开元年间,由于大海带来丰沛的资源 and 利润,中国在传统陆域经济之外,有了海洋经济的强力补充;明朝时期,东南沿海的闽商冲破朝廷的海禁,传承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对接起欧洲人开启的大航海商船,开启了中国经济的白银时代。1978 年至今,改革开放让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闽商推开了中国的南大门,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第三次奔流入海。当代闽籍异地商会所有的辉煌正是中国经济文化第三次“向海”时期应运而生的。

据史料记载,福建从宋代开始,人口即以迁出为主。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无疑又是闽地人口外迁的一个重要时期。而这种大规模、持续性的族群迁徙并非出于逃避天灾人祸,而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生更大的价值为目的。早年的迁徙者在地化了,他们将移居地建设成新的家乡。明代以降,闽商在经商所在地建立起了会馆,不仅沟通信息、联络乡谊,更是传递文化、互助互利的重要场域。遍布全球的闽籍商会与同

乡组织成为闽商创建全球化经贸网络、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的有力佐证。改革开放30多年,闽人在外省经商的人数到底有多少?福建省卫计委从2010年开始组织在全省内开展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今天,我们看到,2013年福建省流动人口数量已达1100万,占福建人口总数的27%,相当于每四个福建人中就有一个是外出流动人口,其中相当部分是经商者。由于闽人的海洋个性,历史以来,福建一直是一个对外(国内的外省、国外)“输出”企业家的重要省份。改革开放初期,闽粤两地同为改革开放试验区,但是,两省在人口的迁徙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广东,一如在清代就确立下来的“十三行”、1949年以后的“广交会”一样,是一个人才、资金与技术的吸纳区。当年,人们用“孔雀东南飞”来形容内地、北方人才大量涌入广东省的现象。如果说,广东省的海洋文化表现为“海纳百川”的吸纳型,那么,福建省的海洋文化则是“惠及四海”的迁播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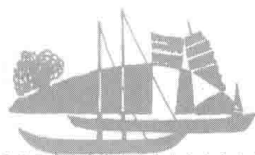
我们以南安市为例,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南安市常住人口141万,在外经商者超过50万,且在异地成立了近50个异地商会,成为全国异地商会数量最多的县级市。改革开放初期,闽人大量迁出的最大目的地是广东省,依次为浙江、江苏与上海。这些区域不仅是地缘上有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些区域所能提供的商业机会。同为开放试验区的珠三角广东省与中国现代工商业最为发达的长三角区域无疑蕴含着无限的商机。闽籍异地商会第一家既是上海福建商会就是闽商这种选择的结果。历史以来,闽商对商机的把握往往就在于能洞察他人所未见,在成熟的市场里业绩赫赫,在未开垦的“商业处女地”也能够把握到机会。改革开放初期,除了西藏之外,闽人迁徙的足迹遍及全国,西藏自治区也就成为省级闽商异地商会最后的一家。

外省迁入福建人数最多的依次是四川、江西与浙江,而福建江西商会正是在福建省设立的外省首家省级异地商会(2006年),福建浙江商会是在福建省设立的第二家外省省级异地商会(2007年)。同时,与遍布全国且数量第一的闽籍异地商会相比,异地在闽省级商会共有9家。香港贸发局驻闽代表处一家,海外的驻闽商务代表处三家。从这些数字看,无不反应了闽人“惠及四海”的迁播型海洋文化的族群个性。

从发展历程看,新时期福建省异地商会经历了三个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是闽籍异地商会的萌芽期;1993—2003年为迅速发展期;2004—2010年为提升发展期。这三个阶段既体现了国家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发展变化,又与闽人的自觉、闽地统战部工商联领导的顺势而为密切相关。工商联、商会、异地商会都是改革开放之后需要重新定位的“新鲜事物”,如何应对,需要一个认识、消化与调整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有一个从粗放管理到精确管理的历程。在这过程中,闽商的智慧与各级管理部门的积极有为,都为福建省异地商会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构成了福建省异地商会发展的鲜明特征。

闽商、闽籍异地商会与中国社会经济建设一样,都是发展变化中的主体。他们改变着世界,世界因闽商而精彩。正如前辈闽商在践行海洋文化中创建了海上丝绸之路,今天的闽商更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生力军。

目 录 contents



上篇 闽籍会馆的商会功能

第一章 会馆与闽商概论/2

第二章 会馆的源流与演进/5

第一节 会馆的界定/5

第二节 会馆的发展/7

第三节 会馆与商业社会的发展/14

第三章 全国各地的闽籍会馆/18

第一节 闽籍商人与会馆的地域分布/18

第二节 从官绅会馆到商人会馆/30

中篇 会馆与商会的并存与交替(1903—1953)

第四章 商会与会馆的并存与交替/36

第五章 近代的商会与行会/38

第一节 清末商会的兴起/38

第二节 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42

第三节 近代异地闽商行会/45

第四节 近代上海商会中的杰出闽商/48

下篇 新时期福建省异地商会(1980—2010)

第六章 时代与商会概论/56

- 第一节 商会与异地商会概述/56
- 第二节 福建省异地商会发展的时代背景/59
- 第三节 福建省异地商会发展概述/65

第七章 福建省异地商会的萌发/75

- 第一节 时代的召唤/75
- 第二节 上海市福建商会的萌发与建设/77

第八章 福建省异地商会的迅速发展/85

- 第一节 阶段特点/85
- 第二节 分布特点/90
- 第三节 组织刊物/96
- 第四节 运作机制/97
- 第五节 典型人物/101

第九章 福建省异地商会的提升发展/109

- 第一节 阶段特点/109
- 第二节 分布特点/113
- 第三节 组织刊物/121
- 第四节 运作机制/123
- 第五节 典型人物/129

第十章 驻福建的外地(国)商会/139

- 第一节 驻福建的外地商会/139
- 第二节 在闽主要境外商(协)会机构/147
- 第三节 福建工商组织与驻福建的外地(国)商会的关系/151

第十一章 福建省异地商会的功能/153

- 第一节 福建省异地商会的特点/153
- 第二节 传承历史与创新机制的功能/156
-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与组织集成的功能/160
- 第四节 桥梁纽带与回馈社会的功能/165

第五节 和谐社会与应对危机的功能/172

第十二章 同业商(协)会/177

第一节 福建省内同业商(协)会概况/177

第二节 异地同业商(协)会的基本情况
——以北京福建茶业商会为例/181

第三节 典型人物/186

参考文献/190

后 记/192

上篇

闽籍会馆的商会功能

第一章

会馆与闽商概论

福建商帮是中国最为典型的海洋商帮,在建立商人会馆方面,福建商帮具有倡始性,尤其在江南的苏州、上海等地,数量与规模均较大。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外商业活动的进一步增多,福建商帮势力进一步壮大,兴建与扩充会馆、公所的努力进一步得到彰显。

明代福建商民四出流寓颇具规模,在江西西北部的袁州府各县,有福建农民租山开垦,大概在万历年间,在这里垦山种麻的福建省籍农民“蔓延至十余万”^①。在江西东部的宁都州,有福建建宁、宁化、上杭等县农民的移垦,他们中有的经过几代经营,“率皆致厚贲,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后召顶耕者,又获重价顶与之”,有的则“尝赤贫任耕,往往驯至富饶,或挈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②。在浙江中部以南的山区,“山林深阻,人迹罕到,惟汀之菁民,力耕火耨,艺蓝为生,遍至各邑,结寮而居”^③。有的就长期居于山中,在宣平县租山种麻种蓝者中,“闽人十居其七,利尽归焉”^④。康熙年间,福建、广东两省人到龙泉县佃山,先种稻薯,后植杉苗,垦民有的以出卖树木致富,原山租主反而日渐贫困^⑤。雍正年间(1723—1735)福建汀州人林上峰与当地入兰氏兄弟在浙江泰顺县合伙佃山,雇工种蓝,作靛发卖,经营资金达几百两^⑥。福建人还移往江苏、山东、四川,直至东北。譬如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锦州一带沿海地方,竟有闽人在彼搭寮居住并渐成村落,多至万余户^⑦。在锦州经商的商人“惟江浙福建两帮,多称盛焉”^⑧。福建人又向南移居广东潮汕,移往海南直至海外,向东则移往台湾。与福建人向外移民同时,外地也有移民移入福建,如在邵武的江西人有南昌帮、丰城帮、抚州帮、进贤帮、南丰帮、广昌帮、贵溪帮、乐安帮,总称江西帮^⑨。在南平,有浙江、安徽、江西的商人

① 同治《袁州府志》卷五,《武事》。

② 魏礼:《魏季子文集》卷八,《与他邑侯书》。

③ 熊人霖:《南荣集》卷十。

④ 乾隆《宣平县志》卷九,《风俗》。

⑤ 同治《龙泉县志》卷一五,《风俗》。

⑥ 《刑科题本》,乾隆元年八月四日浙江巡抚稽曾筠题。

⑦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六,第11页。

⑧ 《锦州市天后宫碑文》,转引自《清代东北史》,第388页。

⑨ 《邵武江西会馆概述》,《邵武文史资料》第3辑,1984年。

分别从事种菇、饮食、木工等行业^①。移民的持续性在福建表现得也很明显,有的家族移动并非一次完成,往往移动了又移动。

对外界的隔膜使乡土之情特别显得重要,人们便由对家族的依附转向了对乡亲的依附,乡音、乡俗、乡土神灵直至乡土建筑都可成为乡人集合的纽带,从而显示出较强烈的地域内倾性,人们几乎无法由政府来安排好他们的命运,于是他们便自发地“互以乡谊联名建庙,把其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②。《宣汉县志》说会馆“其始皆由同乡共里之人,或游宦于其地,或商贩于其区,醵金以为公廨,因得与岁时会议有故,商筹以联桑梓之情,而使寄寓异地者均不致有孤零之叹”^③。因此,会馆的出现有内驱力,即移民们虽然摆脱了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的束缚,但面对举目无亲的陌生环境,怀念故土之情便作为人的一种文化本能或强或弱地表现出来。他们极容易在乡土的旗帜下结成一种自发而松散的联合,因为他们语言相通,习俗相同,思维方式也颇具一致性,这一个一个的联合便构成了一个个亚文化群体,形成一个个会馆组织的林立。会馆本身力图使移民们能够在异乡寻回乡土情感的失落,诚如万历时雷孟曾所说:“诸君知会馆之所以建乎?……夫越人去国数日,见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喜。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蹶然而喜,而况粉榆故旧之馨欵于数千里之外者乎?”^④同时,建立会馆也是移民们力图保持与乡井文化联系的一种努力,因为事实上,移居外地的人们大多都不愿与故土割断一切联系,他们时时想在同乡中操起家乡话聊天,这在当时称为“打乡谈”,时时想从同乡人那儿了解故土的人情世事,时时要魂牵故土,或盼着早日衣锦荣归,或祈求富贵后泽惠故里,于是,会馆经常在联乡梓、固乡谊、祀神明、敬祖先、资贫困、助病弱、葬逝者、祭亡灵、相互保护、协同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会馆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成为寄籍外地人辛勤经营的类于故土乡井的据点,集于会馆的同乡人易于产生如归之感。有的会馆甚至不惜重金,按家乡的建筑风格,用家乡的建筑材料,在异乡构建一个本乡人的所在,当寓居外地的乡人一见到会馆,便似乎回到了故乡。

福建省会福州是福建各地商人初试锋芒的舞台,在上杭街分布了建宁会馆、泰宁会馆、浦城会馆、绥宁会馆,在下杭街有兴安会馆,在横街有福安全馆、建郡会馆,在南台三保有古田馆、永福会馆,在铺前顶有延平会馆、宁德会馆,在夏醴泉有福鼎会馆,在后田有闽清会馆,在南寺有汀州会馆,各地商人“仰怀天妃拥护舟楫之灵”,纷纷集资建立会馆,众多的天后宫展示了闽商的经济实力,共同的天后信仰亦成为他们走向外部世界的精神支柱和凝聚纽带。另外在福建泉州有宁波郊组织宁波会馆,馆址在南门天妃宫,奉祀天妃,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日,就是行东集会日,在天妃宫演戏十多天^⑤。

闽商的足迹遍海内,他们设立的会馆亦遍寰宇,他们以天妃为保护神,依凭于她劈波

① 《南平同乡会和会馆》,《南平文史资料》第7辑,1985年。

② 民国《南充县志》卷五,《风俗》。

③ 民国《宣汉县志》卷三,《祠祀志》。

④ 李景铭:《闽中会馆志》卷三,《汀州会馆》。

⑤ 李玉昆:《略论闽台郊商》,《福建文博》1990年第1期。

斩浪,依凭于她,彼此团结又彼此分化,妈祖更多地成了福建商人的乡土神,供奉着妈祖的福建会馆天后宫亦所在多有。在福州有十余省份在此设立会馆,如江西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河南会馆、两广会馆、奉直东会馆、广东会馆、安徽会馆、山陕会馆、蜀滇黔会馆、浙江会馆、全浙会馆、浙绍会馆、闽浙会馆、江苏会馆等,还有本省地方是兴安会馆、延平会馆、寿宁会馆、浦城会馆等^①,都具有商业性质。

众多的福建商人怀着对财富的向往,忍受着商途的艰辛与离妻别子的伤痛,千里跋涉,至死不辞。在四川的大小城镇,随处可见福建商人的身影,亦随处可见福建商人建立的会馆。他们以“大丈夫志在四方,奚必株守桑梓”的气概开展着长途、短途与居间贸易,就连头发斑白的老妪们亦抱有“株守岂男儿事哉”的情怀鼓励后辈外出经商开拓道路,像福建上杭的廖兴潮“八龄即学贸易”,十九岁时即乾隆四年便奉母命入川,“始至金堂,鲜所获,继贩烟叶于资州,余息稍丰,东驰西骤,经营数载。积银四百两,尽数携归奉母,旋复来川生理,自是于蜀于闽,不遑往返矣。”^②正是这无数的行脚商人带着严母的嘱托,怀着一伸己志的心情,开辟着闽蜀、闽楚、闽湘的商业通道,明清时期的商业发展才臻于一个新的高度。

① 郑拔驾编:《福州旅行指南》第四编,《官署及公共事业》。

② 民国《续修资中廖氏族谱》。

第二章

会馆的源流与演进

第一节 会馆的界定

会馆既然是个老题目,必然不乏众多研究者,而众多研究者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对会馆的认识。但总体上说是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会馆是工商业者的行会,一种认为会馆是一种同乡组织。对于前者,日本学者加藤繁已指出与西欧封建社会中后期基尔特相对应的是中国唐宋以来的“行”,他说:“欧美的中国研究者立即把会馆一词当作基尔特,但是相当于基尔特的却是行”。^① 基尔特的特征在于:(一)它是一种排外组织,加入基尔特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从事本行业的活动;(二)它又是一个特权组织,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并要求遵循国家授意的规章制度。^② 而中国的会馆与基尔特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后者,则几乎是被学界普遍认可的一种定义,如“会馆是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创建会馆的目的在于‘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每逢年过节或每月之朔望,同乡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北京是全国的心脏,皇室贵族以及各地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集聚在这里,并竞相成立会馆”;^③如“会馆是明清时期异乡人在客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它产生于明朝建都北京之后,发展于明朝中叶嘉靖万历时期,并逐渐在全国的通都大邑兴起,清朝已达到了它的兴旺时期,差不多有异乡人聚居较多的地方,就有会馆的出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是研究明清历史不可忽视的一种社会结构”;^④又如“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

① 《唐宋时代的商人组织“行”》,参见(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上),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② 张冠增:《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商业经济垄断》,《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③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前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④ 吕作燮:《南京会馆小志》,《南京史志》1984年第5期。

业务的场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①也有的人把会馆的存在与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等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有人把会馆分为一般同乡人的会馆和商人的会馆。^②有人认为会馆可以是同乡组织,但也可以是同行组织,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象征,商人在会馆设置中有重要作用,甚至试馆亦然。^③有人指出“在北平有广东会馆、四川会馆等等,在上海有广东会馆、宁波会馆、湖广会馆等等,这些组织是以慈善的机能来助同乡人,我们认为毫无疑义的就是这些省区会馆首先是商业资本的组织”。^④如海关监督说浙江的云贵会馆“这个会馆是这两省中有产阶级和商人的代表联合起来的”。而南京的会馆,“这些俱乐部的会员,当然是从商业阶级而来的”。山西各地会馆,“这些会馆的发生特别是由商人方面发起的”。^⑤还有人则认为:“所谓会馆,系寓居异乡城市中同一乡贯的官绅商民所建的馆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外出商民不断增加与城市中土著非土著矛盾日渐加剧而出现的一种封建组织”。^⑥以上可谓众说纷纭,但也各有其合理性。也许由于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就着重强调了会馆的某个方面,因而笔者认为,对会馆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全面而准确的界定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会馆是明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特定产物,它不仅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亦与明清科举制度、人口流动相伴随。明清时期交通的便捷、生产力的发展为贩运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南来北往的商人推进了国内物资的流通,可是由地域文化熏染出的不同语言、文化习俗又构成了商人们谋求发展的障碍,同籍商人的会馆由此有了内驱力,他们起而模仿官绅会馆并发扬光大之。科举制度的发展助长了地方主义观念的盛行,人们为谋求本地人官数的增多,不惜由官捐、商捐来建立会馆为本籍应试子弟提供尽量周全的服务,如闽中会馆甚至为试子提供考前辅导和考后打通关节的服务。^⑦在移民集中的区域,会馆则成为克服土客矛盾、客客矛盾的场所。

其次,在社会功能上,会馆最初是作为同籍在京之人聚集之所而出现的,其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功能日益增加并规范化,“祀神、合乐、义举、公约”^⑧是其基本功能。神灵崇拜为会馆树立了集体象征和精神纽带,合乐为流寓人士提供了聚会与娱乐的空间,人们会在节日期间“一堂谈笑,皆作乡音,雍雍如也”。^⑨义举则不仅为生者在身处逆境时由

①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第11页。

② (日)加藤繁:《清代的北京商人会馆》,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第101页。

③ (日)寺田隆信:《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00年,第561~582页。

④ 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第104页。

⑤ 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第104页。

⑥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06页。

⑦ 王民、林国平:《明清两代北京闽中会馆的教育职能及其演变》,《教育评论》1911年第2期。

⑧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9页。

⑨ 李景铭:《闽中会馆志·郭则云序》。